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波诡云谲的争斗，充满了血雨腥风的对抗。间谍作为最活跃的细胞之一，广布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有机体中，他们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明争暗斗，演绎了一幕幕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惊险剧，展现了登峰造极、波澜壮阔的间谍战。

世界谍战和著名间谍 大揭秘



楚淑慧◎主编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手段，攻下一道道坚硬的防线，获取一个个重要的情报。他们的工作总是与最为显赫的人物或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没有退路，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万劫不复。他们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用心计扭转乾坤，以暗战改变历史，创造了一个个惊险激烈、诡秘刺激的间谍传奇。

世界谍战和著名间谍 大揭秘

第四卷

楚淑慧◎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帝国之花” 谋刺蒋介石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上，一辆高级轿车飞快地行驶。车内坐着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身穿一件中式旗袍，戴着一副可以遮住半张脸的墨镜，似乎不想让人看到她的模样，但是从身段和举止来看，是一位漂亮的贵妇。

汽车在百乐门咖啡厅门前停下来，贵妇缓缓下车，走向咖啡厅，那是她经常来喝咖啡的地方。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用日语喊：“南造云子！”她习惯性地回过头，但立刻意识到上当了，想夺路而逃。就在这时，“啪、啪、啪”三声枪响，她中了三弹，当即瘫倒在血泊中……

这位被枪杀的女子就是曾经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的日本著名间谍“帝国之花”南造云子。她曾在南京政府的官员中建立庞大的间谍网，并两次谋刺蒋介石。她中枪后，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落得了应得的下场。

潜入蒋介石身边

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于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横滨桥。她父亲南造次郎的公开身份是一所日文学学校的教师，实际上是一个老牌间谍。南造云子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浸染。她13岁时被送到日本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并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师，除了学习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之外，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间谍技术。

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从日本间谍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中国大连，在关东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为她在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掩护。三年后，即1929年的一天，土肥原贤二找到南造云子，面色凝重地对她说：“云子，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现在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要在蒋介石身边安插我们的耳目，在国民党的心脏建立间谍网，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请您放心，学生一定按您的吩咐完成任务。”

几天后，一个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的女学生来到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她对那里的所长说：“我叫廖雅权，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停止学业找一份工作。

下
篇
惊
心
动
魄
的
谍
战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所长看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长得很漂亮，又能歌善舞，认为她会非常讨人喜欢，没有按照规定对她的身份进行审查，就拍板录用她当了一名服务员。他伸手拍了拍她柔弱的肩膀：“谁忍心把你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拒之门外呢？”其实，这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就是祸害中国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

汤山温泉招待所实际上是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因为是国防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除了开会之外，这里几乎每天都举办盛大的舞会。国民党军政界高级人员经常在这里出没，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这个招待所。

此后，南造云子就用“廖雅权”这个名字在招待所当起服务员，主要工作是陪那些国民党高官唱歌跳舞，寻欢作乐。她很快就凭自己的姿色和交际手腕在招待所打出了名气，成了许多官员追逐的对象。

南造云子与其他女孩不一样，她看中的不是男人口袋里的钱，而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绝密军事情报。不要钱的女孩，让那些男人更相信她在付出真情，因此更喜欢她。很快她就利用美色钓到几名国民党军官，几乎没费什么劲就窃得了好几份军事情报。其中一份竟然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提交的扩建炮台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台的位置、炮兵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初战告捷，土肥原贤二给予南造云子极高的评价。那些泄露情报的高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身边的美人竟然是一名日本间谍。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南造云子找到了最有价值的目标——蒋介石的私人顾问黄浚。他刚刚升为国民党机要秘书，如果把他搞定，那就等于在蒋介石身边安了一个钉子。很快，她就找到了机会。

一个周末，招待所里照常开着舞会，一个绅士派头的男人端着酒杯站在一边冷眼看着舞池里的男男女女，脸上浮现出高傲的微笑。这里出入的都是高官巨贾，但是没有几个人能令他放入眼内，更别说那些专掏男人口袋里钱的女人了。虽然他也喜欢漂亮女人，但是他非常挑剔，那些浓妆艳抹、胸脯高耸、穿着性感的女人，在他看来都太普通了。正当他感到无聊之际，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黄浚回头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好一个清丽脱俗的姑娘！他连忙说：“请！”

“您怎么不跳舞呢？”姑娘柔声问。

“在你来之前，我还没有找到舞伴。”显然，黄浚是一个高手，他已经展开攻势了。

“那咱们可以跳舞了?”

“当然。”于是两个人牵着手，相互依偎着走进舞池。姑娘把头靠在黄浚肩膀上，吐气如兰，弄得黄浚心里痒痒的。他把头靠近姑娘的耳畔：“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廖雅权，您呢?”

“廖雅权，好名字！我叫黄浚。你是这里的服务员?”

“是的，我们是专门为您这样的高官贵客们服务的。”南造云子一语双关，说得黄浚热血沸腾。

“对了，请问你会养金鱼吗？我家有一些金鱼，下人总是养不好，哪天有空请你过去指导一下。”黄浚一本正经地说。

“您算问对人了。我从小就养金鱼，养鱼的技术不敢说，但是心得总是有的。”

“那么哪天交流一下心得，如何?”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过了几天，黄浚接到廖雅权的电话：“黄先生，您不是想让我指导一下怎么养鱼吗？我今天有时间，能不能去看看您的金鱼?”

“当然可以，我开车去接你！”黄浚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个美人，很快就把她接到公馆。经过精心打扮的廖雅权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气息，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黄浚把她带到书房，书房里确实有一个大鱼缸，里面有几条名贵的金鱼。在廖雅权看金鱼的时候，黄浚给她倒了一杯咖啡：“廖小姐，先喝点儿咖啡吧！”廖雅权接过咖啡，喝了一小口，立即发觉咖啡里放了什么东西。她不动声色，慢慢喝完咖啡之后，故意用惊恐的语调问：“这是什么咖啡？我感到浑身不对劲。”

黄浚故作吃惊地说：“你不舒服？那到床上躺躺吧！”说完把她扶到布置幽雅的卧室。“是胸口闷，还是肚子疼？”黄浚边说边解开廖雅权的纽扣。廖雅权假装挣扎：“不，不要！”色胆包天的黄浚已经轻车熟路地把手伸入她的衣服内。

事毕，廖雅权嘤嘤地哭起来，黄浚哄她说：“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就这样，南造云子钓到了这条大鱼，以后经常到黄浚处过夜。一次，两人亲热之后，她趁机撒娇说：“你我相好了这么久，我有个亲戚是投机商，需要一些内部信息，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黄浚为了讨美人欢心，满口答应了，不但透露内部消息，还帮这位“亲戚”走私。不久，南造云子拿出一沓钱给他，说：“这是我的亲戚给您的报酬。”黄浚欢喜地接过钱，既有美人相拥，又

有金钱入账，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更加热心地透露军政机密，而且把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儿子黄晟也拉下水。

南造云子觉得时机已到，便露出真面目，把一沓钱交给黄浚之后，亮出自己日本特务的身份。黄浚大惊失色，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南造云子笑眯眯地说：“我不叫廖雅权，那个名字是专门起给你听的，我是日本人，叫南造云子，是专门刺探你们情报的。上次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我都汇报给日本皇军总部了，你的功劳不小啊！”

黄浚哆哆嗦嗦地说：“你是日本间谍？”他怎能相信昔日柔情似水的廖小姐竟然是日本特务？

“没错，我是日本间谍。间谍也不坏呀，你看我是不是很可爱？何况我还给你钱呢？只要你继续和我们合作，美女、金钱还是你的，这很划算。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向日本皇军提供情报的事情就会泄露出去，到那时，你们的政府会饶过你吗？”

黄浚权衡利弊之后，在金钱和美食诱惑下，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日本间谍，接二连三地日本窃取情报。在南造云子的指挥下，黄浚、黄晟父子一起编织了一个遍布国民党参谋部、海军部、军政部的间谍网。南造云子成了日本王牌间谍，一些重要任务都让她去完成。

封锁长江计划破产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抢占先机”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时机，抢在敌人的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同时利用海军舰队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的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日本官兵围歼。

出席会议的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大家对这个方案都非常赞同。蒋介石当即签署命令：加强江阴要塞岸炮火力，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线标志，在江面通道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并设置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会议结束时，已经是8月5日深夜了。

这次会议属高级军事机密，会议内容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负责记录。黄浚在会后立即把这个绝密情报告诉南造云子，南造云子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的中村少将，由他用密电报告东京。

结果，日本海军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就在蒋介石刚刚下达命令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的时候，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队和商船全部飞速行驶，逃也似的冲出江阴江面，撤到长江口，所有日本侨民也随船撤离。8月8日蒋介石接到江阴要塞的战报：国民党海军仅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和大贞号。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蒋介石震惊不已，一夜未眠，“这太不正常了！”难道日本军队早有预谋，还是……显然，日本当局在中国方面做出决策后三小时内获得了情报，并且在蒋介石下令封锁江阴的同时或稍后半小时，日本当局发出强行冲过江阴的命令，否则不可能组织这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蒋介石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高层内部已经潜伏了日本间谍，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间谍就是他亲自选拔的又极为信任的私人顾问黄浚。

蒋介石两次遇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中央军校坐落在南京城东黄浦路。按计划，蒋介石不仅要接见军校学生，而且要发表重要讲话，以鼓舞士气。为了保证安全，从中山东路到东黄浦路，从军校门口到会议主席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大量便衣特工追随在蒋介石左右，实行贴身保护。一部分特工严密检查进出会场的车辆，并检查通行证和车辆号，一一登记在案。

那天，蒋介石穿着四季不改的长袍马褂，这对国民党最高统帅来说虽然过时，但是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就像他的光头一样。他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坐上汽车，准备向会场驶去。

军校的师生首先来到会场，军校学生总队队长惠济担任总值日官。学生们列队、报数后静候会议开始。突然，惠济大声宣布：“有两名可疑人员混入校园，正在搜捕，列队的官兵听候命令，不得擅自出列行动！”学生中产生一阵骚动，但是大家都遵守纪律。三分钟后，又有报告：“两名嫌疑犯已露行迹，乘车逃走。”

蒋介石心有余悸，显然日本间谍已经把矛头指向他，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两名嫌疑犯如果没有被发现，那么蒋介石上台演讲的时候，就是行刺的最佳时机。在严格的车辆管制下，刺客如何混进来的呢？刺客逃走又是驾车而去，那是谁的车呢？据守校门的宪兵报告，那辆车好像是行政院的，汽车强行驶出，车速太快，没有看清楚驾车人，无从查找。

1937年8月25日，蒋介石召集白崇禧、顾祝同、何应钦、姚瑩到官邸，

召开秘密会议，黄浚做会议记录。蒋介石宣布：“为了鼓舞士气，我准备明天亲赴上海前线。”众人一惊，黄浚的笔险些掉在地上。大家都觉得太危险了。

蒋介石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全军之首？”

大家对视一下，鼓起掌了。但他的大舅子姚琮却表示反对：“现在日军掌握着制空权，行车太不安全了，不可冒险！”

“国家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蒋某人是贪生怕死之人吗？”蒋介石心意已决。

“问题是怎样才能平安到达前线？”顾祝同不无担忧地说。

绰号“小诸葛”的白崇禧提议：“明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先生坐车去上海，大使的车上有明显的英国标志。日本现在还不敢公开得罪英国，委员长可坐大使的车一同前往。”众人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蒋介石想了想也同意了。于是白崇禧通知许阁森，并特别嘱咐要保密。

8月26日，一辆蓝色本田轿车从南京驶向上海，车顶上有一面醒目的英国国旗。这是许阁森大使的轿车，5个小时后，汽车行驶在靠近上海的嘉定路上。路面被日军炸得坑坑洼洼，天空中不时飞过日本的战斗机，轿车像蜗牛一样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行。

忽然，一阵嗡嗡的飞机声由远而近，两架印有日本太阳旗的战斗机俯冲而来。许阁森心想：“英国是中立国，且国力强大，日本人怎么敢撒野？车顶上大幅的米字国旗，难道日本驾驶员是瞎子吗？”

“轰！”许阁森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日机已经投下一颗炸弹。轿车司机开足马力奔逃。

“轰！”第二颗炸弹直接命中轿车，烈焰腾空而起。

日军好像唯恐车里的人不死，“轰！轰！”又投下两枚炸弹，然后扬长而去。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失色。临行前蒋介石因有紧急军务，临时决定暂缓去上海，许阁森按原计划上路。结果，蒋介石逃过了一劫，许阁森被炸成重伤。接二连三的事件使蒋介石确定身边有间谍。不把这个间谍挖出来，他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8月谁戴礼帽

1937年8月26日晚，蒋介石单独召见三个人：军统头子戴笠、中统头子徐恩曾和宪兵司令谷正伦。

门窗紧闭，蓝色的丝绒窗帘也拉上了。

3个人直挺挺地站在蒋介石面前，一动不动。

蒋介石逐个儿审视他们一番，缓缓地说：“你们都活得不错，嗯？”谁也不敢回答。

“可我今天差点儿被日本人炸死了！”

3个人诚惶诚恐，不敢直对“校长”的目光。

“你们就等着日本鬼子把我炸死，把你们一个一个抓去当亡国奴，是不是？”顿了一下，蒋介石接着说：“军部出了内奸，日本特务就在我身边，你们可都是抓内奸的特工巨头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3个学生仍然不敢做声。

“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别搞屈打成招那一套，找个什么人来顶罪了事，一定要把真正的间谍给我挖出来！”

作为军统头子的戴笠责任重大，立即对参加两次秘密会议的人员逐一筛查。他首先找到白崇禧，两次会议都有他在场，而且换车一事是他提出的。戴笠询问白崇禧时，白崇禧语无伦次，直冒冷汗。根据多年的特工经验，戴笠断定白崇禧不是叛徒。于是戴笠耐心询问详情，得知除了白崇禧之外，还有两个人有嫌疑，那就是姚琮和黄浚。姚琮是蒋介石的小舅子，不可能去害蒋介石，只剩下黄浚最可疑了。黄浚追随蒋介石多年，是蒋介石宠信的机要秘书，官阶虽然不高，但是职位的重要性却非一般的部长可比。难道他是日本间谍？

戴笠把这个想法同徐恩曾、谷正伦一说，他们大吃一惊。谷正伦突然想到：“我听手下报告，黄浚经常和一个化名廖雅权的日本女人鬼混。”戴笠也记起在一次宴会上日本驻南京大使须磨说：“黄浚是我在日本的同班同学，今后须多关照。”于是戴笠说：“据我所知须磨是日本间谍，黄浚与他交往甚密，一定也是间谍！”于是军部立即对黄浚实施24小时监视。

不久，宪兵查到“中央军校刺蒋案”中，两个日本特务乘坐的正是黄浚的轿车，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要想找到证据，最好在黄浚身边安排一个内线，但是黄公馆里的人都是黄浚的亲信，从下人身上很难打开突破口。谷正伦的手下打听到，黄公馆有一个叫莲花的丫头，今年19岁，每天负责买菜，晓之以民族大义，也许能成功。

第二天，莲花出门买菜，一个小流氓走过来调戏她：“哟，小妮子真漂亮，交个朋友怎么样？”边说边伸手去捏莲花的脸蛋，莲花用竹篮子一挡。小流氓变色道：“哟！还敢打人？”更加放肆地扭住莲花拉向自己，小莲花挣脱不开，又哭又喊。就在这时，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一拳打了小流氓一个嘴啃泥。小伙子对莲花说：“姑娘，没事儿了，你放心去办事吧！”莲花对他连声道谢。小伙子说：“不用谢，小妹妹，我们中国人受够了日本人的气，怎么还能自己人

欺负自己人呢？”一番话说得莲花热泪直流。小伙子告诉她，他已经报了名要去前线打仗了。短短几天接触，莲花对他又感激，又敬佩。一天，小伙子告诉莲花，他上战场之前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找出一名日本间谍，可能和黄浚有关，他想请莲花帮忙协助他查清这件事。“苦肉计”虽然老套，但很管用，莲花答应了做他的内线。

一天，莲花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面回来，把一顶礼帽交给他。南京的8月，谁戴礼帽呢？这里一定有文章，于是特工跟踪黄浚的司机进了一家咖啡馆。只见司机把一顶礼帽挂在墙上的衣帽钩上，然后喝起咖啡。特工注意到墙上已经有一顶与司机的礼帽款式、颜色完全相同的礼帽。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人取下黄浚司机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此人是日本领事馆的小河次太郎。

过了几天，小河次太郎头戴礼帽骑着自行车去咖啡馆，突然旁边冲出一个骑车者，把他撞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在一边。几个“好心”的路人及时出现，有的把肇事者扭送到警察局，有的把受伤的小河次太郎塞进一辆汽车，送往医院。小河次太郎顾不上身上的伤，摸了一下头，急得大叫：“礼帽，谁捡了我的礼帽？”没有人理会他的叫喊。

其实，肇事者和好心人都是军统特工装扮的。礼帽自然是被特工捡了，礼帽夹层中藏着日本大使须磨给黄浚的指示。特工换上一封早已准备好的假信，指示黄浚明晚11点让所有间谍到黄浚家集合，由须磨亲自颁发奖金。特工赶到咖啡馆，发现那里已经有一顶礼帽，于是换了下来。回去一看，礼帽中果然有黄浚提供给须磨的情报：蒋介石刚下发的绝密军令，调动6个精锐军团，从苏州、无锡开拔，由张治中直接指挥，赶赴淞沪前线支援当地驻军。另外还有两张军事地图和岸炮火力设置图。蒋介石看后气得脸都白了，大骂几句之后，下令：“立即逮捕，军法审判！”

第二天晚上11点，黄浚家顶楼一支微弱的手电光闪了3下，这是莲花的信号，说明间谍们已经到齐了。一个邮差急急地敲开黄公馆的大门，开门后，“邮差”变成了一身戎装的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他身后是十几名手持冲锋枪的宪兵。谷正伦来到黄浚面前：“黄秘书，你们今天真高兴啊！”

黄浚绷着脸说：“谷司令，这是干什么？蒋委员长如果知道，你可担当不起！”

谷正伦一个耳光打过去，打得黄浚跌坐在椅子上：“你这个民族败类，日本间谍！”

黄浚虽然心虚，但还是嘴硬：“请你拿出证据来，否则我要上诉军事法庭！”

下
篇
惊
心
动
魄
的
谍
战

谷正伦冷笑道：“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说完把一顶礼帽抛在黄浚脚下，继续说：“你们自作聪明，可是南京的8月谁戴礼帽呢？你们的礼帽已经被我们换了，所以今晚才接到我的‘邀请’，让我在这里把你们一网打尽。小河次太郎已经被请到戴笠那里了。”说完一声令下，特工把这些人绑了个结结实实。曹思成、王必贵、李龙海等人纷纷交代罪行，并揭发其他潜伏的间谍。黄浚父子、曹思成等经军事法庭审判后，以间谍罪、叛国罪判处死刑。

同天晚上，小河次太郎也被抓捕。小河次太郎仗着有外交豁免权，拒不认罪。谷正伦等三人商量了一下，把他打晕后装入麻袋，沉入黄浦江。

南造云子之死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一座小别墅里洗过澡，换上和服，焚香拜佛，闭目诵经。忽然，门铃响了，他喝问来人是谁，回答她的是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戴季陶忙起身，打开佛堂的门一看，是一个年轻女子，明眸皓齿，皮肤白嫩，体态丰盈，微微一笑显得分外娇媚。她的美貌让戴季陶顿生好感。这个女子自我介绍，她是日本人，名叫南造云子，特地从上海赶来拜访久仰大名的戴院长。她还报出了几个戴季陶在日本结识的好友的名字。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此后，两人经常往来，南造云子很快就把戴季陶钓上钩，同时，她也付出了身体的代价。

国民党情报部门早就注意到南造云子的间谍活动。一次，她刚从上海潜回南京就被军统特务盯上了，差点儿被抓住。她急中生智，进入鼓楼医院教会后门，化装一番之后从前门出去，登上一辆人力车，潜入国民政府考试院，去找她的老相好戴季陶。戴季陶明知道她身份可疑，还是收留她数日。她频繁往来于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除了与她善于化装又狡诈机警的因素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得到戴季陶的暗中保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和3名助手混入难民群中，潜入南京。她以密信与戴季陶约定，7日后在清凉寺山门外碰头，另一备用碰头点是中央国术馆（戴季陶兼任国术馆馆长，经常去那儿）。

此时，黄浚父子已经被捕，供出两次暗杀活动都是南造云子一手策划的。南造云子已经在军统的监视之中。当南造云子赶到清凉寺与戴季陶碰头时，她被藏在暗处的军统特务抓获。原来她的密信早就被军统人员截获并破解。军统没有惊动不知情的戴季陶，蒋介石鉴于戴季陶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给南造云子，只是起了窝藏与保护日本间谍的作用，便放了他一马，从此对他不再信任。

蒋介石为了挖出更多的间谍，允诺南造云子，只要她如实交代罪行可免一

死。南造云子将黄浚父子的间谍罪行揭露无遗，气得蒋介石等人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这个蛇蝎女人千刀万剐。不过既然有言在先，只好判她无期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

饶她不死，本属幸运，但是南造云子竟然企图越狱。偏偏看押她的狱卒是个好色之徒，对她动手动脚。南造云子喜不自胜，凭借过去的一套手腕，对狱卒恩威并施，怂恿他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并保证如能将她救出，一定给予重赏。狱卒信以为真，还邀了另外一个狱卒协助日本特务把南造云子救出。两名狱卒被财色所迷，结果却被日本特务杀人灭口，也是罪有应得。

戴笠听说南造云子越狱而逃，对她恨之入骨，立即发出命令，就算她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取其狗命。南造云子的身份已经暴露，国统区她是不敢去了，于是潜伏在上海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协助汪伪特工部发展组织，引诱多人下水，抓捕大批共产党人和军统特工，摧毁军统的十几个联络点。她因多年屡立大功，被日本军方誉为“帝国之花”。

国民党军统几次策划暗杀南造云子，都因她觉察而未果。1942年4月底的一天，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被军统特务发现，随即秘密跟踪。她走到百乐门咖啡馆的时候，突遭特工狙击，连中三枪，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因流血过多而死，时年33岁。

高酸铅盐行动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谋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依然存在隐患，国防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1956年，以色列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起了核反应堆，但后来法国停止供应核原料导致计划受阻。为了完成已经开始的核武研发，以色列情报组织策划了两次行动，盗运为欧美等国原子能机构禁运的铀。最终计划成功，原子弹也得以成功制造。

寻觅机会，以色列想要成为核武之国

核武器的研发在当时几乎是全球的一种趋势。美国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核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将两颗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其

巨大杀伤力得到充分验证。随后，美苏两国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核竞赛，各大国也竞相开展核武器研究及实验。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中弹药充足，储备的核弹头产生的威力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足见当时核武发展之热。然而，具有如此强大威力的武器在美国对日本投放之后，却鲜有国家再次使用。一位核物理学家曾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强硬的外交语言。”核武器的威力让人们并不敢轻易将其用于实战，它的存在意义远大于其实战意义。大多数国家谋求试制核弹、掌控制造技术，主要是通过这一终极力量的掌握达到威慑他国的目的。

拥有核武器具有如此深远的战略意义，这让以色列也在积极谋求成为核国家。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而多变，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提升使得防务压力不断加大，进入 50 年代后，美国、法国等为了自身利益和经济原因纷纷同埃及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对西方盟国的不信任也让以色列感到紧张。中东地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为了提供国家发展的动力，西方各国一直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为此，美国甚至实施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不同意为以色列提供核保护。眼见国家安全的形势日趋严峻，以色列政府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核武器的研制是一项大的工程，其中衍生出来的其他应用还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对国土狭小、国境贫乏、人口也很稀少的以色列来说，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情。同时，作为国家威慑力的实质性存在，一旦拥有核弹，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真正独立。以色列处于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能够在这残酷的生态环境中屹立不倒，原子弹是以色列必须掌握的一张“王牌”。

当时，世界上仅有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而法国也只是 1952 年年底才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这些国家都对作为特级机密的核技术采取了垄断措施，对秘密严防死守，确保不会外泄，想要与之达成合作是件很困难的事。以色列对于核武器的需要非常之迫切，一直在寻找机会获取制造核武器的技术。1953 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后第四年，内阁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会由 8 名成员组成，化学家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伯格曼作为这个项目的领导人，有着丰富的履历。他 30 年代曾移居巴勒斯坦，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着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苦于没有机会发展核武器的以色列终于在等待中看到了一点点转机。为了能得到使用原子能的机会，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将其“原子能和平利用”工程中的一座五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送给了以色列。这个反应堆在接收过来之后被安装在特拉维夫以南

10 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由于这个反应堆在规模上根本达不到军事用途，也就一直被以方搁置起来。陷入窘境的以色列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宏伟计划，依然积极地思考着具有可能性的方案——当时世界上的核武器和相关技术已经被美、苏、英全面封锁，想要在这种核垄断的情形下购买一座大功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处碰壁，摩萨德选择从法国入手

环顾全球，以色列人发现跟他们一样急切想要拥有核技术的国家并不只是自己，跟他们情况相似的法国也在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事实上，在得到美国人提供的第一座反应堆之前，以色列已经同法国建立起了核合作关系。在技术壁垒难以突破的情形下，以色列似乎从法国身上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与法国进一步合作的计划……

法国人自认也是世界强国之一，所以成为核大国的心情也很迫切。英国和美国拥有核技术之后严防死守，法国在技术上碰到的瓶颈一时无法突破，想要从英美两国那儿得到帮助又是天方夜谭，整个工程也就陷入了停滞状态。以色列人迅速察觉到法国人正处于困境之中，而本国在科研方面又恰好能够弥补法国的不足，于是向法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主动将自己在核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提供给法国，譬如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以及从磷酸盐（以色列内盖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法国人没有想到名不见经传的以色列在核研究方面的水平竟是如此之高。分析过以方提供的资料信息，法国人发现了这些公式在核研究中的重大意义，惊奇于以色列的慷慨。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以此作为对以方提供技术资料的回报。他们认为，以色列对于核研究的兴趣也不过是限于核物理研究的理论阶段而已。

法国人正这样想的时候，以色列人却试探着向法国人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这与法国人当初的想法不符，而且这样的请求也昭示了以色列人想要制造核武器的野心，想到自己在发展的时候身边也潜藏了一个如此强劲的对手，法国人断然拒绝了以色列的请求。

毕竟，从决定要发展核武器的那一刻起以色列人就预备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困难。既然从法国着手的努力都已经付出了如此之多，以色列人决定继续寻找机会。果然，机会总是青睐着时刻准备着的人，1956 年 2 月，计划终于出现了一丝转机：法国社会党开始上台执政，总理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之强硬，而以色列人又同样坚决反对纳赛尔主义者，于是，两国在

这一问题上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以色列人当然牢牢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和巴黎之间，在同法国进行商谈的时候总不忘提及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以色列人对此坚持不懈，他们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9月21日，在巴黎以北一百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佩雷斯会见了正忙于策划进攻埃及的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这一次的会谈中，以色列终于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筹码。法国人提出了希望以色列军队能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这样的请求让以色列人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佩雷斯也就不失时机地又一次提出了要求帮助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果不其然，双方各有自己利益诉求的情形下谈判自然就容易得多，布歇·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交换条件送给了以色列人，这一事件可谓以色列核武器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以色列投桃报李，在当年的西奈战争中同英法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借助这场战争，耶路撒冷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1957年5月下旬，法国国内政局波诡云谲，先是伯格曼·莫努里就任法国新总理。苏伊士运河事件一出，对法国当局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内阁的频繁换届，让以色列人担心不已。在已经有过核反应堆购买约定的前提下，如果因为法国单方面出现问题不能履行其责任，以色列将面对一次前所未有的失败，而这次，以色列几乎是倾尽所有，不惜付出动用军力的代价。所幸的是，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莫努里并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承诺。在他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于1957年10月2日组织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最终投票方式就此问题做出了决定。在与法国政府的交涉过程中，几经周折才终于确定了下来。

10月3日，即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较之本国已有的那座5兆反应堆，24兆瓦的功率虽然已经有了大幅的提高，但是如果目的是军事用途，依然达不到要求。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面对这样的状况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像从前那样的焦急，而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核技术研究的工作。原来，这24兆瓦功率的反应堆只是协议中约定的第一期工程目标，后续还会在现有基础上将功率增加一倍。

协议签署之后，工程很快进入实施阶段。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数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据《圣经》故事记载，在迪莫纳郊外的内盖夫沙漠的深处，就是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享受过的沙漠中的绿洲。于是，工程工地被选在了内盖夫沙漠之中。在沙漠的深处，以色列建起



了本国的核研究中心，作为配套设施，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也在其不远处拔地而起。迪莫纳核中心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以色列国家的最高机密，它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只是一个“纺织厂”，至于其存在的真实目的，外界一无所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纺织厂”，保护级别却比军火库还要严密，武装警卫日夜不停地巡逻，建筑物方圆几公里远的地带都架设着铁丝网，不仅如此，甚至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一次训练飞行中因为航线错误而误闯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幻影式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立即被布防的导弹击落。

1958年10月，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国家的发展需要能源支持，没有了石油工业发展将会减速甚至停滞，所以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一直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虽然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不和不斗，但双边关系却一直很紧张。考虑到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之前和以色列的协议互相冲突，196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反应堆提供铀。同时，以色列频繁的动作也受到美、法等国越来越多的质疑，莫纳核反应堆本身也已无密可保，以色列索性宣布自己已经进入核时代。

以法关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为了维系两国脆弱的双边关系，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讲坛上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随后又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戴高乐所需要得到的。不仅如此，以色列情报机关甚至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忍痛交出了法国的重要情报提供人、素以“千面人”著称的克劳德·阿诺上校。作为摩萨德在法国的重要情报来源，阿诺曾向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纳基斯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他所参加的一个天主教派组织阴谋派人谋杀戴高乐总统的重要情报。

付出这些代价让以色列极为不舍，但是为了核武器的计划，以色列只好做出牺牲。法国人终于同意提供为完成迪莫纳反应堆工程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分材料。为了核梦想的实现，以色列人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摩萨德不仅从此失去了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并因此背上了出卖朋友的丑名，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然而，他们又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牺牲全都是让步于国家的利益。只要国家的核梦想得以实现，一切都可以忍受！

以法关系破裂，摩萨德开始另觅出路

1962年10月，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正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公司迫于政府的压力，最终终止了向以色列的核原料供应。以法国为来源的核原料供应彻底断了，而当时的情形又是如此：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一个权威性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及其核物质安全监督体系，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在制造核武器的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并不是技术。犹太民族是举世公认的智商最高的民族，在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技术人员方面以色列一直都是人才济济，绝不缺乏“软件”上的支持。即便是当时掌握了核技术、成功研制核武器的英、苏、美，其核技术研究团队中都有大量犹太籍科学家参与其中。

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核原料的缺乏是阻碍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瓶颈，即便是再成熟的技术，没有原料是怎样也出不了成果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能采取偷的办法来获取，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情报部门头上。

情报部门知道其任务的重要性，立即组织人员研究可能获取铀原料的途径。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得出了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袭击运铀车辆。这个方案的行动地点必须在美国本土，而且可能会面对极为森严的防范，其风险性也不低；第二个方案：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这个办法的风险性很高，但有可能得手；第三个方案：对某个特殊实验室主任进行“策反”，通过对对方人员的控制来间接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3个方案中的最后一个将会让“挪用者”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也只有此方案不会与拥有核原料国家一方产生直接冲突。权衡再三，新任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决定采纳第三套方案，这不仅在成功系数上有较高的保证，而且也降低了己方特工人员暴露身份的可能性。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接到任务后，开始集中力量物色可能的“策反”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一批身份特殊而且处于敏感职位的技术人员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其中“钮梅克”公司（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的背景吸引了他们：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其父亲来自立陶宛，是一名正统的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的很多亲戚还在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让家族中很多人遇难，而夏皮罗在美国也曾遭到反犹太分子的侮辱。